



〔法〕周勤丽 著 韩沪麟 译

巴黎泪



〔法〕 周勤丽 著 韩沪麟 译

巴 黎 泪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自传体长篇小说《花轿泪》受到广泛好评，其续篇《巴黎泪》更可令人爱不释手。作品记叙了著名女钢琴家华裔法国人周勤丽奔赴巴黎后的千辛万苦：她拼命练琴，终于夺得了玛格丽特·隆音乐学院的第一奖；为了儿女，她做起了生意，拎着手提包沿街推销，遭尽了人们的白眼、欺凌，但她终于成了一个经营我国商品的女企业家。她又结了一次婚，却又在失望中离异；她也曾结识过一个法国情人，却又饱尝了受骗的辛酸。在流尽了花轿泪之后，我们的女主人公又泪洒巴黎……

《巴黎泪》记叙了这位外柔内刚的女艺术家只身在海外奋斗并获得成功的经过，既凄婉动人，又催人奋发，可使奋斗中的读者获得力量。

巴 黎 泪

ba li lei

[法] 周勤丽 著 韩沪麟 译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186,000字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7,260

ISBN 7-5302-0167-0/I·165

定 价：4.50 元



周勤丽女士近影



周勤丽在巴黎寓所

1973年12月1日，在巴黎的香榭丽舍剧院，玛格丽特·隆音乐学院的第一奖获得者——周勤丽女士首次在欧洲演奏冼星海作曲的《黄河》协奏曲，一个由65名音乐家组成的乐队为她伴奏。中国的民族音乐与欧洲的乐器巧妙地结合起来了。女钢琴家谢幕7次，中国驻法大使向她祝贺演出成功，几百人涌到后台，要求她签名留念。钢琴家热泪盈眶。一个淌尽了花轿泪的女人，终于可以笑着面向世界了……

序

我得再说说，我童年时代的中国是充满苦难和泪水的国家。我出生在1936年，正是中日正式开战的上一年，恐惧便随之而来了。军阀、天灾和饥馑使我的国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外国公司却因此而发迹了。在上海——我的出生地，公共租界的露天音乐台上举办了一场又一场的外国古典音乐会，夜总会里永远是坐无虚席……同样在这个城市里，清管所每年都要从秽物堆和垃圾箱里捡到成千上万个弃儿，他们的父母太穷了，无力养活他们。除日本卷入的、战局错综复杂的战争之外，国内战争也打了十年之久：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军队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搏斗，每天都有一伙伙农民卷入这场战争，于是很快便形成了人海之战。

中国解放前的十三年，我的祖国已经陷入中世纪的黑暗之中。潮州是我祖父母的故乡，在那儿，直到四十年代，人们还在做着买卖小女孩的交易，让她们成为奴婢、小妾或是妓女。父母做主，在孩子年幼时就让他们订亲的现象随处可见，新郎新娘只是在婚礼那天才首次见面。在那个年代，最大的不幸是生个女儿，这是一个没用的包袱，多了一张嘴吃饭而已，直到这个女孩子出嫁，特别是到了置于婆婆严厉的管束之下那天，才告结束。

我的身世也可能就是成千上百万个中国女人的共同经历。

我在十三岁上就被迫出嫁了。我的父亲是一个穷教员，母亲是农家之女。因为我漂亮，父母亲让我做了中国最富有的一个家庭的儿媳妇，以使我免受贫穷带来的更为残酷的折磨。我的父母是世上最值得称道的双亲，父亲是我生命的灯塔。虽然他俩牺牲了我的青春和爱情，但在我整个童年，对我却是十分疼爱的。这样的现象吗，我再重复一遍，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我的婚礼以场面奢华而令人瞩目，在上海最大的一家饭店里，两千多位贵宾以全套的传统结婚仪式和礼节庆贺我的这门婚姻。我的婆家堆满了礼品。南京路上，一些解放军战士，可能经过长征，现在却神情漠然地看着出席婚礼的一辆辆美国轿车。中国刚刚解放，我周围的人尚不能确切地理解解放意味着什么。

六个月后，新政府颁布了一条法律，禁止象我这样的买卖婚姻。在这期间，我窃窃自喜，因为我以自己的牺牲换来了父母亲的舒适生活。我曾经梦想过“白马王子”，但我却与丈夫无爱情可言，我象一个木偶似的回敬着宾客的祝贺。幸而我的丈夫刘玉煌深深地爱着我，他对我爱得非常执著，以至到最后，他的善良和理智使我感动了。我深深感到如果我不尊重这样一个男人，不去做他的好妻子，我问心有愧。不幸得很，刘玉煌病得很厉害，并且自己心里有数。他很早就去世了，享年仅三十九岁。他给我留下了两个孩子，保尔和朱丽叶，他俩是我的安慰和幸福。

我丈夫的死使我陡然间失去了爱情和卫护。在中国天翻地覆的大变革时期，我的公婆如同许多资本家一样，被迫离开了上海阔绰的家宅，到香港定居了。我意识到，我个人的悲哀是微不足道的，包括我的家庭在内的少数家庭的破产也不值一提，因为从此以后，成千上百万穷苦的人终于能希求吃饱肚子了。我说这些话是诚心诚意的，我欢呼中国的解放。不过，我

二十六岁就守寡，拖着两个孩子，置身在暴风雨的漩涡里，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保尔十二岁，朱丽叶才七岁。1964年，当家庭不幸的境遇迫使我离国赴法，并把两个孩子留在香港时，我觉得象丢失了灵魂似的。

《花轿泪》^①就是叙述我出国前的生活的。虽说通过口述重现年轻时代的种种遭遇常使我泪流满面，非常艰难，但我对此毫无后悔之意，我收到无数封陌生人的来信，鼓励我生活下去；我也收到无数封充满着同情和友谊的信，我从这些信中得到了很大的安慰。我衷心地感谢那些对我流露出同情的人们，也感谢那些虽未给我来信，但对我表示好感的人们。长久以来，我以为我注定要成为孤家寡人了，然而现在，我发现我的朋友遍天下。可是，他们无一不向我提出同样的问题，直至现在，还不断有人问我：后来呢，你和你的两个孩子怎样了？

也正是为了回报大家对我的好心，我把尚未叙完的身世，用回忆的念珠继续穿缀下去。我下此决心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当我再次讲述往事时，我将又要度过多少困苦的时刻，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其实，记叙我个人的命运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感到通过描述我那坎坷的人生，可以勾忆出我的祖国的惊人变化。我将继续做这个巨变的见证人，因为我虽说身在法国，但有幸经常回到新中国来。我在那儿出生，我对她的任何不幸与幸福都永远不会不闻不问的。

① 此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1987年出版。

中秋节我起程了/一个中国女人到巴黎/施先生在 奥利 机场/在曼纳大街上与袁家伉俪邂逅/我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秦的人/最初的惊讶/巴卡哈玫瑰上门了/一架钢琴放在木箱上/家书抵万金/玫瑰花的用场

“13”这个数字，难道真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有着神秘的含义吗？它在我的一生中，永远意味着巨大的变化或是骤然的离别。我在13岁上嫁给了一个比我年长13岁的丈夫。13年后，我的丈夫久病不治，与世长辞了。他有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婚后不久，他就告诉我，他随时都会死去。我已经习惯于看见他一次又一次地转危为安，因此当我得知他刚刚溘然长逝时，竟惊得目瞪口呆。家人告诉我，他死时毫无痛苦，平平常常的，就如一束火焰自行熄灭了。他的遗体经过长途跋涉，从香港运回到离上海不远的宁波。他被安葬在当地的一个山丘上，那是风水先生特地为他的父母选定的一处安息的宝地，而他却远远先于他俩用上了。

我的悲哀是无尽的。我从未真正爱过他，但他的善良，他的体贴和温存，使我们的婚后生活过得非常平静，没有发生过什么情感上的大冲突和大波折。在上海，当我还是个骑着自行车去上学的初中生时，他就看中了我。我的公公刘品山是个经

济上有实力的人物，他的掌心红红的，额头发亮；我的婆婆目光如炬，举止神态威严端庄，至少在一开始，她在我眼中属于中国最厉害的那类婆婆。在我过门到他家那幢豪华的住宅之后，我的丈夫以他的温情缓解了这门亲事对我心灵的打击。后来，我们相濡以沫，夫妻间的幸福又因两个漂亮的孩子来到人间而变得更加和谐了。保尔和朱丽叶活泼可爱，智力过人，使我们心里充满了自豪和希望。1964年，即这本小说开场之际，我身边就剩下这两个孩子了，确切地说，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和我的钢琴了。

在我还是小姑娘的时候，我弹的第一架钢琴是我的父亲租来的，以他的经济能力，这可是一项奢侈的开销，而在我那吝啬的祖母看来，则简直无异于发疯了。在我成了富有的刘家的人之后，我才拥有了一架 Steinway 和一架 Bechstein 名牌钢琴。我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几年结出了硕果，在二十岁那年，就成了国家的艺术家，用时髦的语言来说，成了“灵魂的工程师”。当时，我该求得自立，以负担我两个孩子的教育费用，为此，我得继续做家庭教师，拼命干活，把钱积攒起来。可是，我懂得，一个有才华的业余艺术家和能以自己的艺术维持自己及两个孩子生计的钢琴家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因此，我想更进一步，在音乐上有所造诣，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在那个年代，如果中国的艺术家能够在国外深造一番，待遇就好多了。有些音乐家只是在欧洲镀了一层金，就得到了名不副实的声誉。而我，是真真地想去深造啊！

我的婆婆，严厉的刘太太，随着年事增长，对我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她的儿子故世后，我们亲近多了。我也可以把我的想法告诉给我的公婆听了。他们考虑再三之后，方允许我准备巴黎之行。我选择巴黎并不是偶然的，在此之前，我已经被

接受去听著名的音乐家玛格丽特·隆的课程，在香港时，我听从了一个名叫 Barbara·费的好朋友的劝导，给她寄去过一盒录音带。这次，我希望成为一名真正的钢琴家，或者一名音乐会上的演奏家，一两年之后，我将带着一种可靠的专长重返中国。既然我有幸得此天赋，我将以全部力量，全部意志去发挥它。这些首先多亏了我的两个孩子，是他们取代了他们逝去的父亲，时时给我以精神力量。

当我想到将要离开一个年方十三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时，我的心都碎了。我如何能离得开保尔和朱丽叶呢？我如何能割断我们之间的万般柔情呢？然而，正是为了他俩，以及他俩的前程，我才做出了这个决定。当我攒下了足够的钱可以做此旅行后，我就毅然决然地买了飞机票，因为我手头上的钱可以让我在巴黎住上几个月，当然，得尽可能地省吃俭用才行。

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公婆是视巴黎为畏途的，我对他们反复解释也是白搭。巴黎，对我们来说，是世界艺术和音乐的首都，但是，对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巴黎更是一个我们称之为“花都”的城市。“花”意味着浪漫，巴黎代表着美酒、馥郁的香水和纵情极乐。换句话讲，对一个中国女子来说，巴黎是一个容易使人堕落的城市，我在那里人生地不熟，将会碰上一个女人可能遇到的所有的危险。我尽一切努力说服我的公婆，我对他们说，我去巴黎只是专心致志地练琴，我不会见任何人，任何人也见不到我。

于是，我买了机票。在机场告别的一幕，实在令人不堪回首。整个飞行期间，我的心情十分忧郁，因为我的心已留在中国，留在我的亲人身旁。我眼前又晃动着我亲爱的保尔和我的朱丽叶，他们的眼睛噙着离别的泪水；我又记起了在我登上波音客机前，我的公公对我的劝导和最后的叮嘱。波音客机将

载着我飞向另一个国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将成为我的第二个祖国。

我在忙乱中，居然没有想到，我乘坐的飞机起飞的那天正是中国的中秋佳节。我如何能忘掉这个节日呢？照中国农历算，我起程那天正是八月十五。

中国的农历是根据月亮的变化测定出来的：月初代表新的月份开始，也就是月缺之日；而后，月亮渐渐盈满，到每个月的十五那天，即为满月了。接着，月亮又开始亏缺，回到了下一个月月初。每隔四年，就出现一个闰月。不过，八月十五日这一天，月亮最圆，离我们最近，这一天是中国人传统的喜庆日子。按照习俗，这一天例行放假，各家各户大团圆，身在远方的游子也尽量回家和亲人团聚。一个家庭几代同堂，共进节日晚餐，对所有在场的亲人说来，这餐饭意味着吉祥如意和兴旺发达。通常，家人在露天空支起一张大圆桌，大人、小孩沐浴在月光下，分享着美味佳肴，特别是月饼，有咸的有甜的，这是人们为庆祝这一天特制的一种糕点。满月象征着幸福，圆月的月亮如同美满的幸福一样。

然而正是在这一天，我孤身只影，远离祖国，心里充满了忧愁……当人们兴高采烈地大团圆之际，我却夹在一大堆陌生人中出征，去迎接一种新生活的挑战。我还会回到我的亲人们中间来吗？我才二十八岁，前景是一片黑暗。

次日清晨八点钟，我在法国奥利机场降落，置身于一个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世界，无论是人、文字，还是语言。我的忠诚的朋友 Barbara 对我肯定地说，一个姓施的先生会在机场上等我，她早先已把我的照片寄给他了。她也详尽地把他的模样向我描述了一番，说我不会看错人，因为照她的说法，他是中国人中最胖的一个。

我带的行李够多的。我的部分行李经海路运来。由于我肯定长期在外，为了不超重加费，我就把一个中国人长途旅行时不可缺少的另外三件行李随身带着。

这三件行李中有一件是一床粉红色绸面的大棉被。中国人相信，在欧洲，到处都很冷。事实上，欧洲天冷与上海不一样，天热也不一样。在我们那儿，冷天湿度大，阴丝丝的，我们得穿上厚厚的棉衣御寒。在法国，也许冷得厉害些，但是室内有暖气，不用棉被。

我把这床很占地方的被子卷起来，把中国人旅行时弥足珍贵的两件东西裹在里面。一件是一个漂亮的暖水瓶，铁壳子上用珐琅绘上了一朵朵花。因为我们常要用热水，除了沏茶，还需要用来洗手洗脸。在中国，人们习惯用开水，可热水不象在欧洲那样，水龙头里可以放出热水，也不用热水瓶，我们不了解情况，因此起程时总要带上一瓶开水备用。我塞进棉被的另一件东西是一个漱口杯，做漱口用。一个中国人不带上个人专用的漱口杯，是不大会出远门的。就这样，在我卷起的粉红色棉被里，藏着一个热水瓶和一只漱口杯。我把被卷放在膝盖上，抱着。

我一下飞机，就用目光四处搜寻施先生。我以为，他应该在那里等我的。在我的过去与等待着我的未知的世界之间，他是我唯一的联系，虽说这联系在我心里觉得是那么不可靠。

我现在到了奥利机场，混在人群中。我沿着走廊走，双手紧抱着比我人还粗的被卷，它阻挡了我的视线。乍一看，我本人就象一件长着两条腿的包裹。我环顾四周，不见施先生。我开始不安起来，后悔当初不该来。我等着，在大厅里来回走着。我的心情由不安转为烦躁，我焦虑，如果施先生没有来该怎么办？突然，我发现了一个中国人，他魁梧的身材与 Barbara

描述的相仿。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在绝望中绽出了笑容，我向他走去。但这个人一动也不动，对我既不看一眼，也不打招呼，真把我惊呆了。这时，我鼓足了勇气，向他走近，把我的大包袱放在地上，那个人这才大笑起来。他说他也在找一个中国女人，在旅客差不多都已走完时，最后他只见到在包袱下移动的一双脚，不能知道是哪国人，更不知是不是就是我呢。我窘得涨红了脸，因为作为中国女人，脚是特别羞于见人的，从一个陌生男人嘴里说到了我的脚，这比什么都使我难堪。

我终于把向导盼来了。他把我带往他的汽车，这辆车子是老板交给他使用的，外带一位公司里的专职司机。我把随机带来的行李塞进汽车的行李厢之后，那里便没有地方再放我的被子了，于是我又不得不随身带着，放在我的膝盖上。施先生本人够胖的，坐在后座，挤在我的身旁，应该说，一路上我什么也没看见，也不知如何到达了巴黎市区。

从汽车里下来后，我并不觉得施先生办公室所在的那幢建筑物有多气派。这幢房子坐落在市中心，显得阴沉沉、可怜巴巴的，并未体现出被人们吹得天花乱坠的巴黎的美。他对我说，他就在那里上班，此处既是他的办公室，也是他的休息之地，他占用了其中的一个小间。他的房间里杂乱无章，衣服乱七八糟地放在床上，施先生带着歉意说，他走时太匆忙，急于上机场去接我。他请我坐下，并且等着他，说着，他就投入了工作，这时，在他心目中我已不复存在。我坐在这硬板凳上，脑中产生了一连串的问号：他要我在这张椅子上坐多久？他准备怎样给我安排？想到这里，我开始端详他的面目，他的五官生得厚实而端正，眉目开朗，他不说话时，满脸一团和气，但是一开口，却又是那么生硬。突然，他发现了我在对他凝视，便不自在地说：“我处理完这些事，午餐后就帮你找旅馆。”

我听见他说到“旅馆”二字，顿时就感到一阵恐慌，我回答他说，我拒绝到这种地方去。这时，施先生问我愿意去哪儿，显然，我无言以对了。我只能提醒他，在中国，一个女人单独在旅馆住下不合适，对一个寡妇来讲就更是如此。在中国，一个女人外出，一般都在别人家里或朋友处下榻。旅馆什么的只适合一家人旅游或是做生意人住的，要不，就是妓女卖淫之地，而后者使我不寒而栗。我断然拒绝去旅馆。再说，我生性胆小，我会白天怕洋贼，夜间怕番鬼，我会活活被折磨死的。

施先生似乎理解了我的心情，他对自己的唐突感到非常尴尬。怎么办呢？他建议我权且在他的斗室里过一夜，而他本人到别处找地方睡下。我对他的好意心领了，但我仍然不能接受这个建议。即使一个单身男人愿意把床让给我睡，而我作为年轻的寡妇就能同意睡在他的床上吗？我又把这个想法对施先生说了，这回，他恼火了。他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我事先早就应该想好如何解决住宿问题。

他说得未尝不对。不过，在我出国前，旅行社就已经给居住在法国的一对夫妇发了一封信，男的姓袁，是个医生，这两个人本该帮助我安排住宿的，但是，我们当时却没有想妥，在我踏上法国后找到他们之前的这段时间里，该如何安排就宿问题呢？

施先生公事办完后出去了，我仍然乖乖地坐在椅子上，就如我在飞机上端端正正地坐了二十六个小时那样。周围的景象使我更加发愁，一切都是灰蒙蒙的，缺乏生气。透过窗口，我可以窥见到一隅天空，与我孤寂的心情同样悲惨、阴郁。我心中燃烧着的火慢慢地熄灭了。

沉沉的寂静时而被闹钟的滴答声打破，钟声一下又一下地撞击着我的思念之情，我的心还留在中国。我仿佛听见了小朱丽

叶的哭声，她在绝望地向我呼唤——夜里，我的小女儿肯定要找妈妈，除我之外，任何人也不能抚慰她，使她安定下来。想到这儿，我焦虑万分。

施先生来招呼我时，正午已过，午餐的到来解救了我。他在蒙巴那斯林荫大道的一家中餐馆订了饭菜，我们乘了一辆出租车前往。这一次，没有被子遮住我的视线，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注视着巴黎壮美的景色。那宽阔的马路，高耸的楼房和绿荫如盖的林荫大道，大街、小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饭店的女老板林小姐是一个相貌十分清秀的年轻女子，亦是施先生的女友，她亲切和蔼地接待了我们。她特地为我们烹制了可口的鱼鲜海味，这些都是我非常爱吃的。可是不巧，这天我不能品尝，因为按佛教教规，我正碰上了斋期。我不得不拒绝碰这些美味佳肴，还应该说，我又一次让施先生扫兴了，他做了个失望的表示。我辜负了他的一番盛情，很过意不去，便向他解释了我拒食的原因。真的，佛教信徒们是不得伤害牲灵的。我禁食它们的肉，这不仅为我自己，也是为了我的丈夫，为了使他在九泉之下尽可能得到安宁。如果人们真的需要杀戮牲灵充饥，那么杀掉一头牛可吃数餐，总比剥吃大量的螃蟹、虾子罪过小些，因为后者仅仅是为了美食者享口福才不惜消灭这些小小的生命的。林小姐听了我一番话后很是惊讶，她说，她不能想象，当今时代，这样的信仰对我这么一个少妇还有如此巨大的约束力。施先生失望之余，又表示理解我，请我原谅。

他胃口极佳，为我俩准备的佳肴被他一扫而光。餐毕，他向林小姐提出我的住宿问题。她对我们说，她要好好想想，并约定傍晚时分再碰头。

其时，风和日丽，施先生建议我溜达溜达。我首次在巴黎